



隋唐时期黑龙江地区历史概要

魏 国 忠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隋唐时期,黑龙江区域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超过了历史上的其他时代。由于渤海、黑水和室韦等都督府的相继设置和“派官施治”,整个黑龙江地区被纳入唐朝版图,从而在中原内地先进文明的强烈影响下,不但渤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得到空前发展,逐渐与内地间实现了“车书一家”的局面并步入当时边疆各族中先进者的行列;黑水靺鞨和室韦也因为加强了同中原内地之间各个方面的联系,其文明进步程度也都获得了显著的提升。令人注目的是,渤海政权在治国理政方面显现出了“文治”色彩而不是过多地诉诸武力,从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与突厥、薛延陀、后东突厥、回纥、契丹等强大势力取向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都值得人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关键词:隋唐;黑龙江地区;渤海国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8)05-0143-04

隋唐时代,结束了自东汉末叶以来四百年左右的大分裂和大割据的局面,是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时,特别是盛唐时期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不只是惠及于神州大地并给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积极的影响,也相继通过渤海、黑水和室韦等都督府的设置和“派官施治”而进一步地传播并普及到白山黑水间的广大地区,从而大大加快了靺鞨、室韦、达末娄、乌罗护、靺鞨、契丹、拔野古等部族的社会发展历程;尤其是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还曾被唐人誉称为“海东盛国”,不但为开发建设东北边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并逐渐地实现了和唐朝“车书一家”,而且将绚丽多姿的中华文明进一步地传输到当时东北亚区域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一切都使得隋唐时期堪称黑龙江地区历史发展中的黄金时代之一。

1

隋朝是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开皇初年以来,由于政治的相对清明和改变了北周、北齐两个政权奴颜婢膝争事突厥的政策,遂不

但停止岁贡和加强塞守,又发布诏书宣示了“清边制胜”和“制御夷狄”的国策,决定以“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即将岁贡给突厥的金钱赏赐将士以加强边防。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的特大事件,人们从比较中本能地感觉到文帝的作为代表了他们的心声,故其不但深受中原内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也让包括黑龙江地区在内的边疆各族部的人们感到欢欣鼓舞,纷纷主动入贡、朝觐。如靺鞨人即相率遣使贡献,并表示“臣等僻处一方,道路悠远,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得长为奴仆也”;对此,文帝则表示“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双方间可谓建立了亲睦和好的政治联系。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自东汉末叶以来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大分裂和大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既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也给黑龙江地区各部族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态带来了积极影响。尤其是一些边地长官“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隋书》卷四七《韦世康传》),因之不但为亲睦和好局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和条件,而且进一步地将中原内地的封建文明传播到当时的黑龙江地区。

炀帝继位之初,也还能够沿袭开皇以来的政策和作为,甚至于通过塞北巡边和亲自接见、宴请

收稿日期:2018-05-17

基金项目: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核心项目“10卷本《黑龙江通史》”(第3卷:TSh003)

作者简介:魏国忠(193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研究员,从事东北古代史研究。



为数众多的北方各部族的首领、头人等方式,强化了与边疆各部族的亲睦关系。遗憾的是,为时未久,就因为其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大讲排场以及对政治、经济、民族等诸多问题的轻率处理而迅速断送了大好局面。其结果是不但使中原内地的广大民众重新置身于水深火热和不尽的困苦之中,也让黑龙江地区各部族的人们陷入了“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的悲惨窘境。最后,炀帝本人死于非命,曾经富强一时的隋帝国也在内乱中寿终正寝。于是,来自隋朝的影响不复存在,倒是让东突厥人和高丽人得以在黑龙江地区横行霸道、恣意胡为,使得各部族人们的处境每况愈下而进一步地陷入灾难的深渊。

2

唐初的近十年间,黑龙江地区的形式和隋朝末期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但进入贞观年间后,随着唐朝势力的积极进入和各部族的争相靠拢,中原内地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得以进一步地传播到黑龙江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促进了区域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当时,一方面唐朝在太宗李世民的引领下总结和汲取亡隋教训,励精图治,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并整顿边防,短短的几年时间即实现了“贞观之治”,从而争得了人心的支持,国家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另一方面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汗国则陷入了内乱,加之“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导致“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从而迅速没落。于是唐军在铁勒诸部配合下于贞观四年(630)灭掉了突厥。这一切与此前突厥人的所作所为相比较,无疑提高了唐朝和太宗本人的威望,而对突厥降众的宽大为怀——“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四月条),并给予种种优待,更让周边四夷的大小酋长和首领们心悦诚服而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故碛北的铁勒诸部和黑龙江地区的靺鞨、室韦、达末娄、乌罗护、靺鞨、契丹等部纷纷“诣阙请上为天可汗”,出现了“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三月条)的局面;乃至奔走相告、争相颂扬如靺鞨人还远道去往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带向流鬼人宣传了贞观之治的伟业和“天可汗”的德政,流鬼大首领孟蟬遂立即“遣其子可也余志……三译”(《通典》卷二〇〇《边防典一六》)入唐朝贡。贞观二十年平定薛延陀之乱后,因回纥、拔野古等十一姓“乞置

官司”(《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一四》贞观二十年八月庚午条),遂“择其部落”(《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置为六都督府七州,皆以其“酋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并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即将整个碛北地区连同黑龙江地区的西缘部分置于唐朝直接的管控之下。那么十一姓的首领、头人们何以提出“乞置官司”的要求呢?这显然是他们将唐朝的管辖和突厥人的奴役进行比较后所作出的政治抉择。贞观二十一年六月,太宗在下诏宣布由国家出资赎回被迫流落到大漠南北各地的汉族边民的同时,又郑重决定:“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回”(《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一四》贞观二十一年六月条),即对他们与汉族边民一视同仁,同样地由国家出资赎回,更使黑龙江地区各部族的人们感激涕零,于是出现了三十年间“北方无戎马警”(《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的和平安定局面。

尽管这一期间并非毫无冲突和对抗出现,如显庆四年(659)仆固、同罗、拔野古、思结四部的反叛遭到唐军的镇压;又如黑水靺鞨人曾利用高丽政权灭亡后诸部奔散微弱的机会,蚕食和吞并了安车骨、伯咄、拂涅诸部的故地,甚至于乘高丽遗民大规模反唐的机会而进一步南下扩张,勾结高丽残余势力与速末水流域的唐军对峙,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由唐军主导的“东征靺鞨”战役,最终迫使黑水靺鞨人不得不向东北方向后撤。但这些毕竟是个别的事件,总体来看同此前相比较显然是平静多了,各部族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大体上步入了正轨。

3

然而,由于唐朝过分倚重番将和过度优待突厥等族的上层人士,也加速了他们的离心倾向,导致7世纪末叶后东突厥政权的建立和铁勒、契丹诸部的背叛,一时间包括黑龙江地区西缘在内的大漠南北地区再度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境地。在几经冲突和较量之后,碛北和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突厥、回纥、契丹、奚、靺鞨等几支强大的势力,有的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与唐朝相抗衡。期间他们与唐朝及相互间乃至各部族内部冲突不断、纷争不已,其中除靺鞨人所建立的渤海政权外,或逞强用横、迷信暴力,或“自恃兵威,虐用其众”(《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从而导致诸部“怨畔”,造成局势的进一步失控和动荡。直到8世纪初叶“开元之治”的到来,这种局面才告一段落。为防止乱局的再现,唐





玄宗先后在黑龙江流域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面分别建置了渤海都督府与黑水都督府并派官施治,以强化对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管辖和控制;大体上同时又在辽西等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羁縻府州以对各相关部族进行羁縻,所谓“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但到8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唐朝的迅速走向衰落,前此的乱局再现,黑龙江各部族的民众重又陷入了苦海之中。

4

然而其间,以黑龙江东部为核心区域的渤海国,由于革故鼎新和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学习和主动吸收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政治制度上,在王廷中枢仿效唐朝设立“三省六部”,地方上则设置京、府、州、县;军事上也仿效唐而有十六卫之制;司法方面则设有法司和监狱系统。经济方面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能够在寒冷地带大面积种植水稻从而大体上解决了吃饭问题;手工业生产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并解决了冶铁技术问题;水陆交通较之以往更加便捷,并涌现出一批新兴的城镇,其中上京城成为东北地区最大城市。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突出,自上而下地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体制,在儒学、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航海家等;此外佛教也在域内得到了传播和发展。渤海在其全盛时代,有5京、15府、62州、200~300个县,人口300万左右和军队数十万,从而被誉为“海东盛国”。其不仅为开发东北边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由于加强了同中原内地的联系,乃至与唐朝间形成了“车书一家”的局面;而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日本等国频繁交流将绚丽多姿的中华文明进一步地传输到东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从而成为推动区域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渤海国的迅速发展,使其由一个从前被视为不开化的落伍者步入了当时先进者的行列,并足以让当时的渤海人感到意气风发和踌躇满志,在与邻国新罗、日本的接触过程中越来越充满自信。如在唐期间,敢于一再地与新罗人争夺位次的先后高低,表明其在与新罗的长期对抗中已呈现出

渤海强而新罗弱的趋势;同样,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也体现出日本一方逐渐被渤海压倒的场面:“在那种场合,渤海文人容易占上风,而日本文人却不得不甘拜下风。”^[1]但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渤海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成果似乎过多地为其社会上层人士们所享有而很少惠及下层的平民百姓。对上京城一带渤海墓葬群的发掘结果,就足以证实其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之严重。社会内部矛盾重重,故纵有数十万大军也难以抵挡住契丹铁骑的冲击,从而迅速灭亡。渤海国兴衰过程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至今仍值得人们的总结和汲取。

5

相比之下,黑水靺鞨远比渤海逊色多了。史载:“开元十三年(725),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从表面上看,唐朝对其“都督赐姓李氏”的礼遇似乎高于渤海,而且在渤海与黑水靺鞨的对峙期间始终都在支持黑水靺鞨,但从目前所能够掌握到的各种材料判断,黑水靺鞨人显然未能像渤海人那样改变和提高自己而是逐渐地被远远抛在了后边。起初,黑水靺鞨还有能力抗衡,但几经较量到渤海宣王大仁秀即位(818年)后不久的“北略诸部”(《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之际,黑水靺鞨遂逐渐被渤海所征服而处于被役属的地位;除南黑水靺鞨诸部外,连北黑水靺鞨诸部也大体上被其控制,于是黑水靺鞨“不复与王会矣”(《新唐书》卷二一九《黑水靺鞨传》),即不再朝唐。从开元十四年至是,黑水都督府存在九十余年之久。

迄今为止,中俄两国考古人员虽在黑龙江中游两岸发现了上百处黑水靺鞨的相关遗址、多处墓葬群和几十座城址,但无论是其规模还是文化内涵都无法和渤海遗迹相提并论。其中最大的一座城址,即被视为黑水都督府治所的今萝北县江岸古城遗址(也是黑龙江中游两岸最大的古城址),其周长也就只有1200余米。尽管如此,黑水靺鞨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也有了较大发展。以其住处为例,虽仍是“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但已能够“架木于(穴)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即出现了高于地表的住屋。如绥滨县同仁遗址一期房址:“平面基本呈正方形,四壁有板壁……地面一般进行修整,有的铺灰白土,有



的抹有黏土。在靠近墙壁居住面的某些位置铺有木板。”这显然比从前的“地窖子”讲究多了,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高出地面用于居住的屋子了。当时的饮食水平以及一些生活用品的品质,也都比从前有了较大改观。

6

唐朝对室韦诸部的管辖,体现在室韦都督府的设置上。室韦都督府约始建于789—793年间,管辖范围北起今外兴安岭,南至洮儿河流域一带,东至嫩江中游一带,西到达赉湖一带及石勒喀河流域。室韦诸部除履行朝贡等义务外,还要出兵助唐攻讨;从开成二年(837)唐文宗一次即赐给室韦及契丹官人89件“告身”(类似委任状)这一事件判断,双方关系相当亲睦。不过,到9世纪中叶,唐朝在藩镇连兵、朋党之争与宦官专权的漩涡中进一步衰落,逐渐失去了控制边疆各族的实力,其在黑龙江以及东北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荡然无存,室韦都督府最终也不了了之。

不过,这期间一些室韦部落已经走出山林,逐渐向四周广阔的空间谋求发展;有的迁徙到了漠北和俱伦泊(今达赉湖)周围一带,以至8、9世纪之交出现了俱伦泊“四面皆室韦”的情况。不幸的是,强邻回纥人崛起而迫其依附之,乃至连酋长的妻子都得充当人质。而且,回纥人还派来了大量的监使,“岁督其贡赋,且调唐事”;会昌二年(842),唐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派兵反击时,竟然“尽杀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二》会昌二年九月条)。不只是室韦人,其周围的部族如达末娄、乌罗护、霫、奚、契丹、靺鞨以及铁勒等,在分别役属于突厥、薛延陀、后东突厥、回纥等势力之际,命运也都大同小异。突厥等部的共同特点是“自恃兵威”、迷信暴力和肆意盘剥、榨取无度,遂陷当时黑龙江地区各族民众于无边苦海之中。但有压迫就有反抗,那些压迫者和盘剥者们的下场常常是更加悲惨。这其中的一些历史教训同样值得总结和汲取。

7

进入9世纪中叶以后,唐朝进一步走向衰落,中原地区藩镇连兵、军阀割据的同时,包括渤海、室韦、回鹘在内黑龙江和赉北各地的一些部族势力也逐渐走上了“自立”和“割据”的道路。但其结果则是导致了局面

的混乱、失控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定,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干扰和破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首先,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高度发展的中原封建文明的传播和普及,大大促进了黑龙江地区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其影响之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历史上的其他时代。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之所以能够如此,很大程度是出于当时“黑龙江人”的主动要求。其次,当时的黑龙江地区与中原内地间在各个方面交往与联系之密切,也超过了历史上的其他时期;而且唐代建置一系列府州和派官施治,历史上首次几乎把整个黑龙江地区纳入中国的直辖版图。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其中许多府州的设置都是当时“黑龙江人”主动要求的结果。再次,渤海国由于革故鼎新和采取开放政策,主动学习和吸收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积极发展、振兴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才得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如大体上解决了冶铁技术和人民温饱问题;水陆交通得到改善并涌现出一批新兴的城镇;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作家、诗人、高僧、艺术家、航海家等。从而与唐朝间实现了“车书一家”的局面并步入了当时边疆各族中先进者的行列。在这个强凌弱、大欺小的弱肉强食时代,渤海人以其突出的“文治”色彩而不是过多地诉诸武力,走出了一条与突厥、薛延陀、后东突厥、回纥、契丹等强大势力取向不同的路径,其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都值得人们认真总结和汲取。最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以及为此而执着付出的种种努力,始终在影响并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在突厥、薛延陀、后东突厥等政权的兴亡过程中,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人心向背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古火田彻.渤海的文化使节侧面再探——渤海后期的中华意识、对日意识.李东源,译[C]//杨志军.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高句丽、渤海专号.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

[责任编辑:王 昊]

